

顾绶昌与莎士比亚研究

李伟民

摘要: 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顾绶昌的莎剧版本、翻译、语言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顾绶昌莎剧版本研究、莎剧翻译研究、莎剧语言研究等主张的梳理、研究,认为顾绶昌的莎学批评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顾绶昌重视莎作翻译,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莎剧翻译中版本选择的重要性,强调了版本选择是否合适,对莎作内容及人物性格分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明白、正确地指出了一些著名莎剧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认为研究莎作的语言应该结合伊丽莎白时代的语言特点,从社会、生活和戏剧性角度综合考虑,尽量保存、再现俚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词语和其中的隐喻。语言变化与社会生活变化相关,莎剧中保存了很多经典和鲜活的语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莎作的基础。对于莎作可以从读音、拼法和词义等语言学角度出发,考虑莎作的翻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点。

关键词: 顾绶昌; 莎士比亚; 版本; 翻译; 语言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DOI: 10.12002/j.bisu.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7)06-0101-09

引言

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顾绶昌(1904—1999)先生的莎学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一生用力最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语言与翻译研究领域。虽然受时代的影响和政治环境的拘囿,他撰写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不多,但在莎学研究上却形成了版本、语言及翻译研究的鲜明特色,开先河地针对莎作语言、翻译,尤其是版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强调莎剧翻译的版本选择、语言形式和基本莎学知识对于莎剧汉译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梁实秋、朱生豪和曹未风译本中存在的若干不足,因而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莎士比亚研究重要学者之一。那么,顾绶昌的这一莎学主张是如何形成的呢?对莎学研究有何影响?在当下的莎学研究中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作为一位毕生热爱莎士比亚的学人,顾绶昌1936—1938年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1970年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任教。除了教学工作外,他参加过修订《英

汉四用词典》，翻译《拿破仑一世传》和《光荣与梦想》等书的工作。20世纪50至80年代，顾绶昌分别发表过《谈翻译莎士比亚》《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对〈黎琊王〉的一些意见》《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等重要莎学研究论文，因而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莎学研究专家。

顾绶昌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倾心于莎士比亚基本知识的学习，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注意搜集、比较莎作各种版本。他认为如果缺少了莎作的版本知识和基本莎学素养，很难做好莎作的翻译，因为版本选择是翻译莎作的第一步基础工作。他发现，梁实秋、朱生豪所选择的“牛津版”存在着不少缺陷。早期莎剧译者由于对版本选择不够注意或因时代、环境原因无法关注莎作版本问题，所以往往在翻译莎作时对莎氏时代的早期现代英语的性质、语音、拼法乃至词汇的理解产生某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但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更与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历史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文学翻译不但是“一种在‘等值原则’指导下的语言形式的变易，更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译介活动”（朱安博、朱凌云，2008）。笔者认为顾绶昌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莎作翻译中版本选择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指明上述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问题。尤其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中国讨论莎学的论文不多，顾绶昌能够从版本、语言、翻译的学理角度明确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了。那么，顾绶昌先生的莎学见解是从何而来的呢？由于国内翻译界、莎学界长期以来对顾绶昌研究语焉不详，资料匮乏，故而缺乏深入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简要追述顾绶昌先生莎学研究经历的基础上，厘清他的主要莎作翻译和研究观点。

一、受惠于“广博”“扎实”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训练

顾绶昌早在中学时代就显露出文学才华。顾绶昌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黄桥乡一个自由职业家庭。192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感受到时代风潮的顾绶昌，未满18岁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感觉与认识论》，“批评康德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唯心主义直观的认识论”^①，

^① 顾绶昌. 往事·回忆·愿望——记我平凡的一生 [A].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C].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05. 在这篇描述生平 and 学术研究历程的文章中，顾绶昌提到，自己在1947、1949年的《学原》上还撰写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学原》1948年第6期）和《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后一篇文章，笔者从创刊到终刊的《学原》上均没有查到。）。

时任该报主编的张东荪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1924年,顾绶昌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投考北京大学英文系,本科一年级读过陈源的“英国小说”;二年级读过温源宁的“莎士比亚”“英国史”等课程。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开始对莎士比亚产生浓厚兴趣。鉴于莎学的博大和庞杂,他体会到钻研莎学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否则很难取得切实的研究成就。

1936年,32岁的顾绶昌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伦敦读书期间,他需要补修过去没有读过的古英语、中世纪英语等课程,开始接触到有关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版本研究等问题。他从伦敦浓郁的戏剧氛围中感受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莎士比亚研究者,不但要善于从文本中挖掘有关问题,更应该擅长从剧场的角度,从演出中获得莎剧各方面的知识。他甚至还带上《莎士比亚全集》,一边观看莎剧演出,一边记录自己的观剧心得和感受,了解表演、导演的细节、人物的性格特征乃至布景等,研究文本与舞台改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通过舞台演出了解莎士比亚,是学习、研究莎剧、亲近莎士比亚的极好方法。

作为一个读书人,逛书摊、访旧书成为顾绶昌伦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末和节假日,他经常光顾伦敦卡陶尼亚市场或陶琳顿广场的旧书肆,在浩如烟海的旧书中搜罗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有关莎氏知识的“珍本”“孤本”。在旧书肆中他购买了1910年出版的亚历山大·许密特的《莎士比亚大辞典》、颇为精致的法国雕刻家梅琳奇落款刻制的莎士比亚铜像和1597年出版的《森林法》、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博物志》,以及1800年以后出版的有关莎氏的作品。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许密特的《莎士比亚大辞典》也算一部绝版书,他买到的竟是平常很难得的第三版;此外,他还买到了亨利·安文爵士的《莎士比亚演出版》、哈利威尔·菲列浦斯的《莎士比亚事略》等等。^②流连于伦敦书肆之中,每当买到较为罕见的莎作“珍本”“善本”和“孤本”,顾绶昌总不免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为了弄清莎作的读音和语法问题,在书摊上他曾经与伦敦一个教区的教会会长讨论莎作中的读音和古英语与中世纪英语历史渊源之间的关系。显然,在英国期间,这段读书、访书的经历为他日后的莎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奠定了顾绶昌今后的莎学研究方向。

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在异邦的顾绶昌时刻思念着处于灾难之中的祖国,再也无心羁留海外,遂于1938年春回国,应成都四川大学之聘担任英语讲师,

^② 顾绶昌.买书[N].武汉日报,1947-01-13(第10版).可见吴宓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第六期)。吴宓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工作,团结了一批学人,顾绶昌当时也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二人多次讨论莎学,并与吴宓过从甚密,有时手牵手引领吴宓登上渡船。

随后被聘为副教授、教授。顾绶昌在四川大学开设了有关莎士比亚的课程, 根据自己的研究, 他认为莎士比亚的近代辑注本, 包括阜纳斯父子辑注的“新辑注本”、陶顿等人合辑的“阿藤版”以及在英美流行的各种学校用书在内, 都不太适合中国学生学习莎士比亚作品。因此顾绶昌根据《牛津大辞典》、艾伯特的《莎士比亚语法》和牛津克莱伦登版的《莎士比亚的英国》等书, 参照各家评注, 编写了比较详尽而又适合我国学生实际需要的莎剧选注本。教学之余, 顾绶昌还在峨眉山伏虎寺的草棚礼堂里导演过莎剧《威尼斯商人》。

抗战胜利后, 顾绶昌才有机会坐下来, 运用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学到的莎学知识并结合自己所搜集记录下的各种莎学资料, 撰写了 *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 (《学原》1948 年第 6 期) 和《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此时, 在国内莎学研究和莎作翻译中, 尚没有人注意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问题, 即使在一些已经翻译过来的莎作, 包括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等人的译本中, 也很少谈到版本之间的比较以及如何选择最权威莎作版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莎学研究中像顾绶昌那样较早关注莎士比亚著作版本、语言研究的学者、译者和论文不多。至今, 莎作的版本和语言研究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仍处于薄弱环节。顾绶昌眼光独到地介绍莎剧版本的基本情况和新目录学在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 开启了中国莎剧版本研究的先河。他对河畔版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的评论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为译者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选择最佳权威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比较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1946 年秋至 1954 年夏, 顾绶昌受聘于武汉大学外语系, 主讲英国小说、写作、“乔叟至弥尔顿之诗”及翻译等课程, 同时从事莎士比亚和肖伯纳戏剧研究。他利用武汉大学丰富的藏书阅读了 18 世纪以来各位莎评家的莎学论著, 并参加了吴宓受正中书局委托对《牛津双解袖珍词典》的编译工作。吴宓与顾绶昌曾同时在四川大学授课, 并为武汉大学外文系同事, 仅《吴宓日记》第十册记载, 吴宓与顾绶昌的交往就达近四十次, 其中多涉及讨论莎士比亚研究。后来, 顾绶昌又在中山大学开设了莎士比亚课程。1970 年, 他由中山大学调往广州外国语学院, 承担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工作。1980 年, 顾绶昌恢复了教授职称, 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专题, 在介绍国外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 重点讲授莎士比亚语言艺术, 为此暂时放下了他擅长的莎剧版本学研究。这一时期他开始撰写《泛论对莎士比亚的探讨途径》, 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 重拾莎士比亚研究, 在《外国文学研究》1982 年第一期发表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该文后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转载)。该文相当深入地探讨了从中世纪英语向近代英语逐渐转变过程中莎作中的语言性质、

语音、拼法、语法、词汇等特殊用法,强调“了解莎士比亚语言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是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基础”(1982:16~28)。

二、莎剧翻译、语言与版本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内莎学研究尚不够繁荣的情况下,顾绶昌接连发表了3篇论文介绍了莎剧版本研究之沿革,并对莎作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顾绶昌被错划为右派,直到80年代,在其垂暮之年,我们才又看到他的莎学研究文章。顾绶昌比较了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译《哈姆雷特》,认为“梁译文字干燥乏味,每句似都通顺,合起来整段都不像舞台上的对话……朱译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啰嗦,就是太简慢,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曹译文字生硬,语病和错误最多,漏译的地方也不算少。”(1951:54~58)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由于译者对莎士比亚的英文和基本莎学知识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解,没有采用最广泛的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翻译莎剧。顾绶昌所强调的是,翻译莎剧应该熟悉、研究伊丽莎白时期的社会生活,上自王公贵族,下自贩夫走卒、泼皮娼妓等各色人物的语言习惯和语言特点,充分注意到其所具有的时代因素、俗文化特征、生动鲜活的口语特色以及鲜明的戏剧性等舞台特点。作为一位莎学研究者,顾绶昌依然强调莎作翻译中的版本选择问题,与他一贯的主张相契合,认为“翻译莎剧,完全没有版本和艺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版本选择的问题,在莎译工作中也是一个先决的问题”^③。要做好莎作的翻译工作,首先应该从语言和基本莎学知识入手,如果单纯注意语言问题,而忽略了对基本莎学知识的了解,不可能对莎士比亚有深切的理解。翻译莎士比亚比较多的几位译者,都只注意到莎士比亚的“无韵诗”在译文中如何表达,对于基本莎学知识,例如“版本”问题则很少关注。关于莎作版本的重要性,顾绶昌根据自己对莎作版本的比较勘验,强调从事莎剧版本研究,目的在于从各种语言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认为只有从美学研究层面出发,通过核对、校勘才能恢复莎作原本的内容和莎氏笔下人物的真实形象。他认为版本研究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含剧作年代的考证、剧情来源的梳理、不同版本之间译文的比对、舛误文字的校勘,同时也要注意筛选各家的评注等。为此,作为莎作翻译工作者需要对早年四开本

^③ 顾绶昌.谈翻译莎士比亚[J].翻译通报,1951(3):9~11.(顾绶昌最早提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选择问题,指出了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各自莎剧译本有待改进之处。)

和首版对开本进行详细考证,弄明白哪些是“劣本”四开本,哪些是“善本”四开本,并且能够清晰区别“善本”四开本与“首版对开本”之间的不同特点、性质和相互关系,以此区分、辨析哪些真正是莎作的原文,哪些是舞台记录者根据自己的回忆记录的剧词,甚至能够辨识残缺不全的剽窃盗印本。17世纪末出版的莎剧版本,由于仅仅是对“劣质”四开本和“首版”四开本的重印,故权威性不够,特殊价值不大。在18至20世纪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比较权威的版本,有些版本强调只有把莎作中最为可靠的剧词呈现出来,才能以此作为编辑莎作的蓝本。顾绶昌在比较了众多莎作版本的基础上,赞赏有些版本的编纂以新目录学研究成果为统领,将其运用于编纂和校勘之中,在莎作翻译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欲使莎作翻译更臻完善,莎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对于莎剧还应该借助于对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发展和特点的深入了解,从读音、拼法和词义等语言学角度出发,考虑莎作的翻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莎作翻译和莎学研究向前发展。

顾绶昌认为,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莎剧中保存了很多经典和鲜活的语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莎作的基础。莎士比亚的语言是继中世纪英语之后,开早期现代英语之先河的语言,它吸收了古罗马、凯尔特和盎格鲁萨克逊等文化的精华,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在不断演变中发展而来的语言。研究莎剧中的语言,既包括文法、拼法、发音、古字体学(Paleography)研究,同时也应该涵盖为何莎剧在多数段落中采用无韵诗形式,少数段落中采用散文形式,为何早期莎剧的无韵诗中夹杂双行骈韵体较多,晚期莎剧则较少。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是那个时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其在文法上的特点之一,是几乎任何一种词类,都可以用作任何一种词类,那个时代英文词汇的拼法,是完全没有确定的。正因为莎士比亚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用那个时代人民的语言来写作,所以顾绶昌认为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怎样把最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用来翻译莎作,使莎氏在中文译本中成为一位最伟大的人民戏剧诗人。对于原文的俚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等,都应该尽量设法保存。其实,早在1948年,顾绶昌先生就以英文发表了《对〈哈姆莱特〉段落的新评论》(2016: 43~44),在对《哈姆莱特》语言的研究中注意到,哈姆莱特给奥菲利亚的情书中有这样的剧词:“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亚——这是一个恶劣的句子,‘艳丽’两字用得非常下流的”。随着现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和女权主义莎学研究的介入,一般认为《哈姆莱特》具有较强的“厌女意识”(misogyny),“即对女性的厌恶、怀恨、误解、不信

任,以及希望她们永远处于附属地位”(袁宪军,2007)。而顾绶昌从词汇学角度并结合其他莎剧中同类词汇的运用,对“艳丽”(beautified)这个单词进行了仔细辨识,并从莎氏的用意、时代环境、语言发展、马洛对莎氏的攻击等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由此得出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新观点。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个单词经常出现于信件之中,但是奥菲利亚的父亲波洛涅斯对哈姆莱特这样的表白却表示出异常的反感与愤怒。在该剧中,莎士比亚让波洛涅斯以带有强烈色彩的词汇谴责,是在回应罗伯特·格林对自己的攻击,后者在《千悔得一智》中诅咒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靠我们的羽毛装饰自己”,以此反击格林这个穷困潦倒而又尖酸刻薄的剧作家的中伤行为。这充分说明莎士比亚是从社会生活出发,汲取了民间语言,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在20世纪50年代,以何种文体和形式翻译莎剧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在翻译莎剧译文的形式上,朱文振曾经考虑,莎剧翻译应该体现原作的“非现代”特点,可以以元曲的形式,主要以韵文方式来对应莎剧中所谓“诗境”很高的台词,叙述的其余部分则采用“散白”的译文,译文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元明‘杂剧’中的‘曲’”^④,“韵文部分可用鼓词调唱出,非现代京腔的散白可仿京剧散白的中原音中的原腔道出”。朱文振曾经设想过“仿戏曲体翻译莎剧”,并动手翻译了6部莎氏历史剧和其他莎剧片段,但在文革中丢失,仅留下一些残稿,例如《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亨利六世》中“大小家私,好生看住;心神提起,不可马虎……谨慎门庭,抵得看家有狗;小心在意,赛过商量帮助……”“一身粗鲁相,好逑风雅谈不上,淑女步翩翩,我在一边不象腔,叹此生无福把这份欢乐享……只落得阳光下顾影自悲伤……”“昏花眼,只等瞑目时分到,风烛残,油干光暗无多泪,背酸麻,担够一肩愁与苦,臂无能,两树衰藤低且垂……”。这种模仿“元曲”、刻意回归中国古典语文的译文方式,在现代白话已经被国人普遍应用、现代新诗已经普及的基础上,

④ 朱文振. 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莎剧译例[J]. 翻译通报, 1951(1): 14~15. 朱文振将莎剧译为“元曲”的观点, 尽管没有得到孙大雨、顾绶昌的赞成,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且以元曲形式翻译了6部莎剧。20世纪50年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但没有接受朱文振补译的与散文体译本非常不同的元曲体译本。因为朱生豪是以白话文翻译, 朱文振则采用戏曲体翻译, 文体不同, 体式差异甚大; 但朱文振译稿文革中丢失后仅留下一些残稿。参阅: 朱文振. 仿戏曲体译莎几个片段[J]. 外语教学, 1981(3): 46~50. 当时曾有将朱文振论述自己翻译主张的文字收入其胞兄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设想, 但据朱生豪之子朱尚刚先生的看法, 将如此篇幅的论证散文体译文之不合理想的论文作为散文体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附记”实在是并不合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元曲体与朱生豪散文体译文“体式相差太大, 理论界又有‘文学大众化’的主张”, 最终没有接受朱文振承接朱生豪译莎剧全集的补译工作。

显然既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也难以得到其他译家的认同。所以，顾绶昌也是不赞同朱文振用元曲形式翻译莎剧的。这就是说，在语言符号的表层之下，还隐含着众多深层次的意象，二者有时并不完全对等，因为“意象与一般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意象比一般的语言符号更能体现文化历史的积淀性”（仇蓓玲，2005）。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中注意源语与目的语，意象与文化之间的双重甚至多重转换。顾绶昌强调，把莎剧中的无韵诗分成“诗境很高”和“平铺直叙”的两个部分，前者译为韵文，后者译为散白，这是不妥当的。无韵诗固然不是散文，但也不能把韵文和散白加以割裂，如果硬性区分，就不是无韵诗了。莎剧中的无韵诗结构变化多端，非一成不变，也与所谓“十二字的中国无韵诗”大异其趣。而以韵文形式把莎剧译成元明杂剧的曲调，再以中国读者熟悉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借配原作中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也会淹没莎剧，显得太中国化了。莎剧是诗剧，译文不仅要注意诗的形式和意境，更应该关注诗剧的戏剧性因素。顾绶昌的翻译观点是：译诗，贵在得其神韵，至音调旋律，其次要者也。顾绶昌期望莎学研究应该“通过对整个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探讨，借重这一时代的语言在它的读音、拼法、词义以及塑造形象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来推动莎学的继续前进……西方学者一向不愿认真研究伊丽莎白的社会时代背景，不重视莎氏所受到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也不知道试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人物性格的特征”^⑤，因此造成了其莎学研究和批评的局限，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中国的莎学研究正可以充分发挥其研究优势，为世界莎学研究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结语

顾绶昌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莎学研究学者，他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版本、语言和翻译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在莎学研究上的独到见解，指出了中国莎剧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着手翻译了若干莎剧，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文字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是，他的这些研究观点，至今还是我们翻译、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重要指导原则。今天当我们检视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时，期望以我们不懈的努力可以告慰顾绶昌等莎学研究先贤。

^⑤ 顾绶昌. 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续）[J]. 外国文学研究，1986（2）：10~15. 可参阅：顾绶昌. 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J]. 外国文学研究，1986（1）：62~67. 顾绶昌后来在给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来信也多次谈到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版本问题，并坚持自己的主张。可参阅：顾绶昌. 会员信摘[J]. 中华莎学，1981（1）：15.

参考文献:

- [1] 顾绶昌. 买书 [N]. 武汉日报, 1947-01-13 (10).
- [2] 顾绶昌. 谈翻译莎士比亚 [J]. 翻译通报, 1951a (3): 9~11.
- [3] 顾绶昌. 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 [J]. 翻译通报, 1951b (5): 54~58.
- [4] 顾绶昌. 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 [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 (1): 16~28.
- [5] 顾绶昌. 往事·回忆·愿望——记我平凡的一生 [A].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第六辑) [C].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305.
- [6] 顾绶昌. 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 (续) [J]. 外国文学研究, 1986 (2): 10~15.
- [7] 顾绶昌. 对《哈姆莱特》段落的新评论 [J]. 胡鹏译.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 2016 (1): 43~44.
- [8] 仇蓓玲. 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2): 96~100.
- [9] 袁宪军. 汉姆雷特的批评轨迹 (下)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版), 2007 (4): 64~71.
- [10] 朱安博, 朱凌云. 译介学的名与实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8): 1~5.
- [11] 朱文振. 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莎剧译例 [J]. 翻译通报, 1951 (1): 14~15.

收稿日期: 2017-03-30

作者信息: 李伟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312000;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400031, 研究方向: 莎士比亚。电子邮箱: 83517459@163.com

Gu Shouchang and Shakespeare Studies

LI Weimi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Gu Shouchang's transla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his Shakespeare studies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hakespear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his study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works and studies. H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versions in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of Shakespeare's plays, emphasized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analyzing contexts and characters, and pointed out some problems in some famous Chinese versions of Shakespeare's works. He also believed that schola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anguage features in the age of Elizabeth I, and translator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preserve and reproduce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words such as slangs, puns, etc.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taphors. The language of Shakespeare's plays is the basic element and origin for us to make research on Shakespeare. We can study the translation works of Shakespeare from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features in his plays. Gu disapproved of some translators'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such as translating Shakespeare's play with the forms of Chinese Yuan Drama. When we do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Shakespeare's play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styl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as well as the dramatic elements of Shakespeare's works since his plays are poetic dramas.

Keywords: Gu Shouchang; Shakespeare; versions; translations; language